

“折叠”死亡的寓言：《立体几何》中的科技伦理

The Allegory of “Folding” Deat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in *Solid Geometry*

郭英剑（Guo Yingjian）刘向辉（Liu Xianghui）

内容摘要：作为伊恩·麦克尤恩早期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异作”，《立体几何》偏离了他向来关注青少年、儿童和年轻人问题的主题模式，通过反乌托邦的科技伦理书写揭露了极端化的科技崇拜现象，并对现象背后的道德危机进行了隐喻式批判。作品借助三个不同叙事层次、不同类型的“死亡”事件以寓言形式呈现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在社会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方面的伦理秩序失衡乱象。亨特之死是对学术伦理秩序物化的反抗，“M”之死是对友情伦理秩序衰亡的控诉，妻子之死是对家庭伦理秩序崩塌的痛击。通过营造三场看似“温情平和”实则“震惊骇人”的“折叠”死亡悲剧，《立体几何》不仅表达了对科技偏执狂群体的控诉，而且对如何解决科技伦理危机提出了无声叩问，进而呼唤构建一种和谐的生命伦理秩序。

关键词：死亡；寓言；伊恩·麦克尤恩；《立体几何》；科技伦理

作者简介：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刘向辉，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系2019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城市意象研究”【项目编号：2019BWX02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Allegory of “Folding” Deat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in “Solid Geometry”

Abstract: As one distinct work of Ian McEwan’s early short novels, “Solid Geometry” differs from the habitual subject pattern of concerning adolescents,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Instead it discloses the radical phenomenon of worshi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means of anti-utopi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writing, and implicitly criticizes the hidden moral crisis. In virtue of three “death” events of different narrative layers and different types, “Solid Geometry” demonstrates the ever-lasting disordered ethics in terms of social relations, friend relations and conjugal relations in the form of allegory. The death of Hunter is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materialized academic ethics, the death of “M”

is an accusation to the dying of friendship ethics, and the death of “my wife” is a heavy attack to the collapsing family ethics. By constructing three seemingly “tender and mild” but virtually “shocking and scary” “folding” tragedies, “Solid Geometry” not only expresses the accusation to the scientific paranoiacs, but silently poses a question of how to solve the crisi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calls forth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ife ethics orders.

Keywords: death; allegory; Ian McEwan; “Solid Geomet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Authors: **Guo Yingjian** is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English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Email: yjguo2006@gmail.com); **Liu Xiangh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nd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93614305@qq.com).

引言

作为一个在文学批评界和商业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功的当代英国作家 (Wells 250), 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1948-) 继续以笔耕不辍的姿态书写着“多产作家”的形象。然而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中后期的长篇小说创作, 而对其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缺乏充分的关注, 且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恐怖伊恩” (Ian Macabre) 的观点范式。以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 (*First Love, Last Rites*, 1975) 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确通过“满纸满篇尽是乱伦、残暴、变态性行为和谋杀”的“震荡文学” (literature of shock) 手法营造出阴森恐怖的现代社会画面 (蓝纯 23), 但是这些作品不仅仅通过恐怖画面制造出“在神经和情感上留下永久划痕”的“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 还通过打破“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边界的创作手法 (余华 4-5), 反映出作者对人性中残忍、易堕落一面的异常敏感 (陆建德 300), 同时表达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忧思和伦理关怀。

相较于小说集《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里的其它几个作品, 《立体几何》 (“Solid Geometry”) 似乎偏离了“关注青少年、儿童和年轻人问题的主题模式” (Malcolm 21), 而通过反乌托邦的技术伦理书写以兼具“温和”和“惊悚”的手法揭露了极端化的科技崇拜现象, 并对现象背后的道德危机进行了隐喻式批判, 呼唤构建一种和谐的生命伦理秩序。作为伊恩·麦克尤恩非自然叙

事的一个典范之作（尚必武 31），《立体几何》借助三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死亡”事件呈现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在社会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方面的伦理秩序失衡乱象。造成人类伦理秩序失衡的一个关键诱因是对科技的过度崇拜和滥用。作品中的亨特之死是对学术伦理秩序物化的反抗，“M”之死是对友情伦理秩序衰亡的控诉，妻子之死是对家庭伦理秩序崩塌的痛击。无论是故事语境中的亨特，还是历史语境中的“M”，抑或当下语境中的妻子，他们都在以看似“温情平和”的“折叠”场面中“无影无踪”地死去，营造出震惊的骇人悲剧。这些骇人悲剧的出现不仅是对科技偏执狂群体的控诉，而且对如何解决科技伦理危机提出了无声叩问。

一、激情无意的自杀——科技崇拜与学术悲剧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层面“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理念，还是培根实验科学层面“知识就是力量”的功利主义原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技理性的发展。科技理性带来的实用价值引导人类不断探索新的科技领域，并去展望未来美好社会。日趋显现的理想愿景在 18、19 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终于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即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人类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乌托邦梦想。科学乌托邦思潮的盛行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和崇拜，甚至促使了科学神话的崛起。科学神话的出现其实是后启蒙时代人类对现代科技的复魅，而这种复魅会引发人类构建一个不断趋于“合理化”的社会秩序，进而营造一个具有“多数人暴政”色彩的“大同世界”幻象。幻象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物化的本质。在物化思维的侵蚀下，原本应当充满生机活力的学术活动变得越来越固化，犹如一个牢不可破的线性封闭空间。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若要打破线性的封闭空间，势必付出代价，抑或酿就沉痛的学术悲剧。

《立体几何》中人物“M”所讲述的苏格兰数学家大卫·亨特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学术圈物化的故事。在故事中，亨特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这一重大几何原理，其“价值超过了马克思和达尔文著作的总和”（麦克尤恩 14）。为了让学界同仁关注自己的重大成果，亨特打破了所处 1870 年代学术活动的传统秩序，没有按照学术会议为其安排的顺序发言，而在会议的第三天自告奋勇地展示所谓的、抑或自嘲的“重要结论”。在 1870 年，以数学学科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圈已经形成了物化的形态特征。在长达两周的学术研讨中，各位数学家按照其在该领域的地位先后进行发言，地位较高的人发言之后一般就离开，不会聆听关注后面诸多发言者的观点。这种金字塔式的运行机制基本预设了权威至上的学术规约，即处在上层地位的学者可以凭借业已铸就的权威身份面向众多听众乃至整个学术圈发表、传播自己的学术论点，进而达到强化权威地位的目的，而处在底层地位的学者只能在“人数不断减

少”的凄冷氛围中孤独无奈地发表见解。底层学者的见解犹如沧海一粟，只是物化学术结构中可有可无的小零件，无法激起具有震动效果的浪涛。

尽管物化的传统学术规约抑制着新生力量的发展，但笃信科技理性的暗流是不甘沉默的。在学术会议上毛遂自荐的亨特正是此股暗流的携带者，这也正是近代科学史发展的缩影。亨特“无表面的平面”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学术圈无疑是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击波。他第一次以白纸为媒介的“折叠实验”换来的是众人“轻蔑的嘲讽”、“茫然的讪笑”、“一钱不值的杂耍伎俩”、“愚蠢而不知所云的斥责、谩骂和恐吓”（麦克尤恩 16-20）。对于固化已久的学术圈来说，人微言轻的亨特单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一个被戏谑为“炫技表演”的折纸实验是不会掀起轩然大波的，他需要具有终极意义的大手笔之作才可撼动传统、换取所求。早已做好准备的亨特终于被迫使出杀手锏：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进行折叠实验。亨特的“身体折叠实验”的确赢得了在场者的一致惊呼，但与此同时却葬送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作为一个数学家，亨特精于探索求证、勇于挑战权威和敢于自我牺牲的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似乎体现了一种创新求变的科学精神，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亨特的行为依然是对当时学术建制的一种盲从，他无非是通过展示与众不同的科技成果来构建自己在学术圈的权威中心地位。就技术视角而言，亨特的“无表面的平面”结论是一个颇具革新意义的发现，也正是他以反权威之法构建自我权威的应然之道。在试图构建自我权威的过程中，亨特没有走出社会物化的怪圈，而是以自我物化的形式与物化的社会对接。

亨特与社会的物化对接凸显或夸大了基于科技创新的心智理性（intellectual rationality）和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即过度肯定了逻辑论证与技术工具的形而上价值和功利化价值（周立斌 16-17），而忽视了道德层面的伦理价值。科技崇拜思想的盛行会激活“少数人”内心的酒神式“迷狂”因子，使其罔顾生命伦理。在亨特的折叠实验中，他对一张白纸以及自己身体的“冷静”处理似乎充分诠释了科技的“理性”，而“理性”背后潜伏着一种“不顾行为后果的”的“非理性”（韦伯 57）。在论证“无表面的平面”原理时，亨特只考虑到如何让实验对象消失，而没有考虑或根本就不能实现如何让实验对象回归，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漏洞的科技发现，但对于旨在步入学术主流或构建学术权威地位的亨特来说，这个不完美的“重大发现”足以满足其欲求。唏嘘的是，在面临物化欲求与生命伦理的抉择时，处于迷狂状态的亨特选择了物化欲求。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亨特身上非理性的兽性因子开始膨胀，致使他身上自由意志的失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8）。自由意志的失控只会助长虚假需求，而虚假需求的肆虐会遮蔽人类的视野，使其难以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进而沦落为错把社会同一性需要当作个人差异化需要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6）。在虚假需求的遮蔽下，亨特已经不能清晰区分

社会同一性和个人差异性的界限，更不能做出体现理性意志的伦理选择，而只能在科技崇拜思想的裹挟下以“飞蛾扑火”之势奔向“无意识激情”铸就的深渊，最终通过无意识的自杀成为盲目科技崇拜的殉道者。凭借对科技力量的盲目崇拜，亨特满腹激情地以自己身体为媒介勇敢进行折叠实验，而他内心根本没有预期到生命将一去不返的悲剧，依然“无知”地期待某日回到英格兰取回交给他人暂存的论文。激情背后的无知与无能充分体现了亨特对自身生命权的践踏，这也恰恰是这场学术悲剧最大的痛点。

二、难以言说的误杀——科学实验与友情悲剧

在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蔓延浸染下，人类实践的目标和价值被置换成某个研究领域的构成要素，充满了工具理性特征，而其价值指称逐渐弱化。作为建构科学乌托邦甚至践行科学乌托邦的一个途径，科学实验是人类对科学发展与人类未来之间关系的不断猜测、解答和试错（邬晓燕 62）。虽然试错法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试错的频频出现会激化现代科学与社会生活的矛盾张力。一旦缺失了前置性道德引导与后置性的伦理匡正，科学实验就易于陷入以人性沦丧和人的物化为代价的异化状态（杨怀中 249），进而引发不可估量的灾难，这在人体实验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

《立体几何》中“我”的曾祖父和“M”堪称一对儿交情甚久也甚密的朋友，然而他们的深厚友情却在科学实验的干扰下瞬间不复存在。外祖父虽然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科技工作者，但“爱好清谈、数字和理论”的他却“喜欢以数学家自居”（麦克尤恩 4）；“M”的身份虽然在文中没有交代清楚，但是他同样“颇具学究气”（麦克尤恩 6）。或许正是共通的“学究气”使得曾祖父和“M”在十几年的交往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从差异性看，具有实干风格的“M”不仅“深谙今世风尚”，“对伦敦了如指掌，多次到过欧洲大陆”，而且“熟知社会主义和达尔文学说”（麦克尤恩 10）等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因此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游刃有余的社会人；而“我”的曾祖父则是一个从年轻时代就“嗜好坐在炉火边论证推理”（麦克尤恩 10）、而对“屋外”世界几乎不管不问的科技人。二人的差异恰巧以互补形式加深了其友情，即在世俗社会纵横捭阖的“M”可以为只沉湎于科学论证的曾祖父提供源源不断的实验素材。

无论是从交往时间看，还是从交流内容看，“M”与“我”曾祖父的友情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二人的友情最终只是虚化为科技崇拜的牺牲品。确切地说，“M”最终成了曾祖父科学实验中没有任何生命尊严与价值的“物”，也可以说成为在一场人体实验中失去自我主体意识的实验对象。“M”的悲剧充分再现了人体实验等诸多科技实验活动的高风险性以及背后更为严峻的伦理价值缺失问题。在科技理性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中，人类道德取向不确定性的产生摆脱不了利益追逐、权力获取、欲望满足等因素的影响。一旦科技

实验的物性价值超越道德价值，科技活动隐匿的风险性就会日趋显现，甚至引发灾难。《立体几何》中“我”的曾祖父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但却是一个拥有强烈执着科学实验意识的“专业”业余科技爱好者。作为一个“专业”的业余科技爱好者，曾祖父既没有自觉的风险预防意识，也没有系统的风险防范能力，更缺乏应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和人文关怀意识。在他的世界观中，友情中的交往自由原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渡给了利益原则。对于“我”曾祖父来说，所谓的利益只是为了满足纯粹而疯狂的科学知识探索欲望。在成功劝说“M”为其取回论文、并经过反复推演之后，“我”曾祖父终于重建了苏格兰数学家大卫·亨特早年提出的“无表面的平面”理论。至此，曾祖父的科学实验算是一种突破性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地主导了一场有违生命道德伦理的人体实验。

在人体实验中，虽然对象有所不同，但就科技伦理而论则是相同的：人体实验必须保护、尊重和促进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最重要的是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和自由选择，避免任何形式的诱导、欺骗和强迫（王学川 137-138）。但在作品以人体实验为基础的特定伦理环境中，随着“我”曾祖父科学探索欲望的疯狂膨胀，他的伦理身份开始变化，进而导致伦理混乱。这种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我”曾祖父不再把友情当作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反倒利用友情积极怂恿挚友“M”参与实验，这既是情感理性缺失的表现，也是对人体实验基本伦理的无视与践踏。“M”则出于对“无表面的平面”理论的怀疑或好奇，以“被动”形式借助怀疑论者身份“主动”参与了实验。作为一个怀疑论者，“M”显然不明白、也不相信实验存在的风险，而对于“我”曾祖父来说，他只是渴望看到实验结果，同样不了解或根本就无暇无心顾及可能的风险。从性质上看，这场荒唐人体实验既是一场违背知情同意原则的欺骗实验，也是违背人道主义的强迫实验。作为实验的主导者，“我”曾祖父充分利用了友情关系和朋友的怀疑论者身份，以诱导、欺骗和强迫形式让“M”成为一名受试者，并亲手误杀了“M”。之所以说“我”曾祖父的行为是误杀，是因为无法确定他杀害朋友“M”的动机，而只能确定他怂恿“M”参与实验的动机。至于实验带来的后果，他和“M”都是无法预料的。在此意义上，“我”曾祖父和“M”都是不折不扣的怀疑论者。遗憾的是，“我”曾祖父最终成为了一个误杀朋友的刽子手，“M”则成为了一个被朋友误杀的牺牲品。“我”曾祖父误杀“M”的行为正是科学人战胜社会人的隐喻缩影。作为社会人的代表，“M”之死既是对科学实验肆虐发展的无奈退缩，也是对友情退场进而演化成悲剧的无声回应。

三、步步为营的谋杀——科技滥用与家庭悲剧

除了盲目的科技崇拜和科学实验，科技滥用也是科技理性主义思想蔓延

的恶果。虽然如影随形的科技怀疑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在尝试通过揭示文明社会的种种危机，来对人类的过激行为和偏执理念提出警告，为科技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坐标（赵建军 80），但终究因为式微而无法真正阻遏科技滥用行为的加剧。科技滥用不仅让作为人类创造之物的技术得到了“反转”的主体性地位，颠覆了其“为人的”基本伦理特质，而且让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 580），沦为技术霸权的牺牲品。科技滥用凸显了技术霸权的意识形态性，其结果往往是具有技术优势的权力持有者对弱势群体的碾压。技术霸权不仅仅体现在国家之间、公司之间等经济政治领域，而且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意识中（哈贝马斯 63）。

在《立体几何》中，叙述者“我”借助科技手段对妻子步步为营的谋杀正是技术霸权在家庭伦理场域等非政治化层面渗透的表现。“我”对科技的痴迷和滥用完全把技术霸权主义推进到了“恣意妄为”的境地，而这种极端化做法势必让技术发展偏离民主化方向（李树德，曾长秋 106），进而铸就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剧。“我”和妻子梅茜结婚六年来一直矛盾冲突不断，既没有和谐的性生活，也没有深度的情感交流。对于“我”来说，婚姻已经成为一个枷锁，因此整理发表完曾祖父的日记之后与妻子离婚是摆脱婚姻困境的首要选择，然而对技术的占有却让“我”有了新的选择，即用曾祖父日记中基于“无表面的平面”理论的人体折叠技术来谋杀妻子。“我”在离婚与谋杀之间的抉择完全是一个伦理选择过程，而这个选择过程取决于“我”的脑文本。根据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因此，什么样的脑文本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或者说，什么样的脑文本决定什么样的人（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3）。在此意义而言，“我”的脑文本已经在兽性因子的怂恿下背离了伦理价值，也导致“我”的行动抉择缺乏相应的伦理意识。

在“我”的脑文本框架中，沉湎工作和试图摆脱婚姻原本是并行不悖的两大关键词，但在占有令人震颤的“人体折叠技术”之后，“我”就把两个关键词合二为一——用技术谋杀妻子。显然，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技术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参与共塑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这种共塑其实是一种非中立的技术调解，具有显著的伦理意向性（贾璐萌，陈凡 39）。遗憾的是，在一个道德模糊性的后现代时代，人类虽然拥有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鲍曼 24），但其选择本身却面临着伦理意向不确定的状态。人类伦理意向的不确定，必然导致其伦理敏感度的不断降低，也势必导致人类伦理责任意识的淡化甚至丧失。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状态下，叙述者“我”只是“迟疑了片刻”（麦克尤恩 25）就决定在妻子身上进行“人体折叠”

实验,而“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疲惫感让“我”突然产生了如此欲念。“我”的疲惫不只是纯粹的身体疲惫,更重要的是对妻子和婚姻的疲惫。所谓的疲惫只不过是掩盖“我”谋杀妻子的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我”早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善恶观念,或曰“我”的脑文本在技术的调解干预下已发生了异化。

脑文本的异化让“我”作为人的情感钝化为“物”,而情感的物化让家庭悲剧增添了一种骇人的色彩。一方面,情感物化的“我”更加沉湎技术,把占有技术霸权当作人生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追求,进而继续忽视或无视妻子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让原本脆弱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也正是基于此种状况,“我”对妻子只有嫌弃、怨恨,甚至仇恨,因此尽管妻子通过正式道歉以求换得“我”的谅解,从而恢复或重建美好的家庭生活,但“我”根本不为所动,只是佯装答应,反而坚定了杀妻之心,并紧接着在夫妻恩爱过程中用“人体折叠技术”把轻信爱情的妻子毁灭。由于缺乏基于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认的话语沟通环境,“我”和妻子之间早已构筑了一道不平等的话语桥梁。在这种不对等的话语伦理关系中,妻子完全处于有“声”无“力”的弱势地位,妻子的话语已经在或隐或显中沦为技术霸权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情感物化的“我”在人性堕落之路上越陷越深,进而加速了家庭悲剧的诞生。

“我”不仅利用妻子对爱情的笃信心态,精心策划出充满爱情仪式的技术谋杀圈套,而且在步步为营的谋杀中,面对妻子在消失过程中的挣扎、悲呼和疼痛,没有任何的情感触动或丝毫悔意,依旧沉醉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只是惊叹于折叠过程中妻子肢体对称呈现出来的“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并“感到神情恍惚,头皮发麻”(麦克尤恩 28)。“我”利用妻子的情感漏洞精心设计谋杀的行为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而对妻子身体的疼痛,“我”不但表现得无动于衷,反而把其作为个人快感的基础,则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这场家庭悲剧中,“我”俨然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技术霸权占有者和谋杀者,而妻子则是情感物化和技术霸权的双重牺牲品。

结语

《立体几何》借助三层叙事结构展现了技术伦理失衡酿就的“折叠”死亡悲剧,具有较强的现代寓言意义。作品借助三个死亡悲剧的营造,一方面呈现了 1870 年代以来科技理性主义思想蔓延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人类崇拜技术、沉迷科学实验、追逐技术霸权等疯狂状态;另一方面呈现了现代社会中技术形塑人类生活的演进过程,揭示了技术干预下人类伦理意识趋向模糊的物化惨状。作品中亨特、“M”和妻子等三人之死虽然具有一定的魔幻现实色彩,但是可以启示读者思索现代社会技术崇拜背后的道德危机。遗憾的是,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中只是通过技术伦理书写描绘了一幅具有反乌托邦意味的现代寓言图景,披露了技术异化和情感物化合谋造成的人类伦理危机,

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在技术愈加盛行的当下，或许无人可以提供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作品中提及的“人体折叠”技术目前虽然尚未出现，但近年来换头术、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立体几何》的技术寓言性。人类只是借助所谓的技术任性地把人体消失于无形、任性地编辑基因，却对如何恢复或拯救消失的身体、如何让基因编辑婴儿健康成长则置若罔闻，根本没有对应的伦理责任意识。这种把人的身体和生命盲目任性技术化的行为是当今社会的严重伦理危机。这不仅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严重挑战，而且是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无情践踏。麦克尤恩虽然在《立体几何》中没有提供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案，但却呈现了技术非中立化的严重后果，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技术崇拜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科学发展应当回归到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的初心本位，而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世人都应当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伦理责任意识，要对不断加速发展的新技术及其后果做出系统评估，需要重新确认人类的位置，呼唤构建一种和谐的生命伦理秩序。

Works Cited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Bauman, Zygmunt. *Postmodern Ethics*. Trans. Zhang Chenggang. Nanjing : Jiangsu People Publishing, 200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Habermas J..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Trans. Li Li and Guo Guanyi.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9.]

贾璐萌 陈凡：“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自然辩证法研究》6 (2018): 39-43。

[Jia Lumeng and Chen Fan.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Subject in Technology Mediation.”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34.6 (2018): 39-43.]

蓝纯：“伊恩·麦克尤恩其人其作”，《外国文学》6 (1998): 24-28。

[Lan Chun. “Ian McEwan and His Writings.” *Foreign Literature* 6 (1998): 24-28.]

李树德 曾长秋：“第三条道路：在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建构的三个向度”，《求索》10 (2013): 103-106。

[Li Shude and Zeng Changqiu. “The Third Road: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einberg’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Seeker* 10 (2013): 103-06.]

陆建德：“‘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世界文学》6 (2000): 289-300。

[Lu Jiande. “‘The Essence of Civilized Life’——Reading *Amsterdam* by Ian McEwan.” *World Literature* 6 (2000): 289-300.]

Malcolm, David. *Understanding Ian McEwan*.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Marcuse, Herbert. *One Dimensional Man*. Trans. Liu 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卡尔·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Marx, Carl. "Speech at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Paper*."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II).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 [McEwan, Ian. *First Love, Last Rites*. Trans. Pan P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 汉斯·摩根索：《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杨吉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 [Morgenthau, Hans.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Trans. Yang Jip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3.6 (2011): 1-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1 (2010): 12-22.]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 (2017): 26-34 页。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9. 5 (2017): 26-34.]
- 尚必武：“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果壳》的胎儿叙述者及其脑文本演绎”，《外国文学研究》40.3 (2018): 30-42。
- [Shang Biwu. "A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he Foetus Narrator and Its Brian Text in Ian McEwan's *Nutshell*."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0.3 (2018): 30-42.]
- 王健：《现代技术伦理规约》。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 [Wang Jian. *Ethical Stipulation for Modern Technology*. Shenyang: Northeastern UP, 2014.]
- 王学川：《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 [Wang Xuechuan. *The Value Confli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Its Resolutio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6.]
-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I). Trans. Yan Kew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0.]
- Wells, L. Ian McEwan[G]/Shaffer, B. W. *The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1.
- 郭晓燕：《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 [Wu Xiaoyan.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Utopian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杨怀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Yang Huaizhong. *Ethical Retrospec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3.]

余华：《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作家》2008 年第 8 期，第 4-6 页。

[Yu Hua. "The After Effect of Ian McEwan." *Writer Magazine*. no. 8, 2008, pp. 4-6.]

赵建军：“技术悲观主义的价值功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2002): 79-82。

[Zhao Jianjun. "Value and Role of Technology Pessimism."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 .2 (2002): 79-82.]

周立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Zhou Libin. *Lukacs' Materialization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